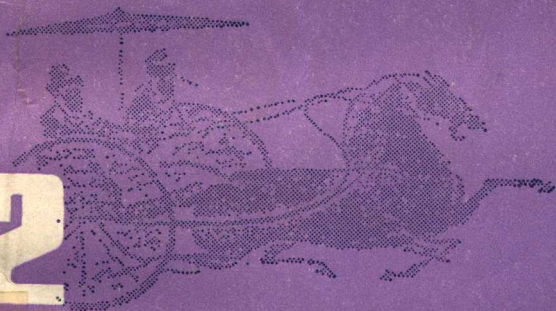


WENSHI ZHISHI 1987

12

12



文史知識

敦煌文学研究漫谈

先秦时期的士

“射”和射远兵器

唐代道教与政治

中国神话研究之我见

当前古典文学宏观研究漫评

项 楚

刘泽华

周世德

羊华荣

袁 珂

王 玮



医药学院610 2 01472392

文史知识

1987年第12期

(总第78期)

• 治学之道 • 敦煌文学研究漫谈	项楚	3
• 史学史百题 • 老树春深更著花——清词述略(下)	严迪昌	9
• 历史百题 • 先秦时期的士	刘泽华	14
• 怎样读 • 《史记》《汉书》比较	瞿林东	21
诗 文 欣 赏 缠绵宛转 曼妙动人——《九歌·山鬼》赏析	鄢乾湖	28
人生易老 友情长存——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	杜东枝	32
情景融浑 命意深——谈戴书伦《过三闾庙》诗	刘逸生	35
• 古代科技漫话(8) • 夺得千峰翠色来——享誉世界的瓷器	李亚东	37
文化 史 知识 先秦时期的战旗、战金、战鼓	杨英杰	41
“射”和射远兵器	周世德	47
古代法律的公布	蔡燕莽	52
• 金石丛话 • 九、魏晋南北朝石刻	施蛰存	54
•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连载四十一) • 清代官制(二)——因地制宜的地方官制	王钟翰	59
人物 春秋 中国历史上永不会磨灭的人物——吴起	李衡梅	63
曾巩和他的散文	鲍时祥	68
绝代才人 薄命君王——南唐后主李煜新传(5)	田居俭	74

• 宗教与人生 •

唐代道教与政治

羊华荣 81

金元戏曲与道教

李日星 85

• 文史信息 • 城市的本质及古代中国城市的起源(90)

如何看尧舜禅让与篡夺(90)

日本是怎样吸收外来文化的(91)

中国神话史研究之我见

袁珂 92

谈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詹鍈 99

• 文史古迹 •

古钟之王——北京大钟寺的永乐大钟

钟炜 夏明明 103

• 书画欣赏 • 吴伟的《灞桥风雪图》

张敏 107

• 文史信箱 • 腊八节与古代的“蜡祭”

詹鄞鑫 110

俗语} 一心不乱 口头禅

佛源} 习气 大彻大悟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08

• 文史研究动态 •

当前古典文学宏观研究漫评

王玮 116

《文史知识》1987年总目

120

• 补白 7 则 • 犯颜执法(20) 习说(51) 古人带兵(62)

120

刘玄佐巧贻军(73) 君子不谓小善而不为

(80) 最早劝人学医的皇帝(98) 杜甫为何

自号“少陵”(115)

北京大钟寺永乐大钟(封二)

《灞桥风雪图》(封三)



敦煌文学研究漫谈

项 楚

项楚，籍贯浙江永嘉，1940年生，现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唐宋文学研究室主任。曾获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近年发表有关唐宋文学(包括敦煌语言文学)论文30余篇，并著有《王梵志诗校注》(即出)、《敦煌文学丛考》(即出)，参加编写《宋文选》、《敦煌文学作品选》等。

1962年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取四川大学研究生，专攻六朝唐宋文学。当时我潜心研究的对象，是在我国封建社会文化高涨时期涌现的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从童年时代起，我就深深迷恋着这些伟大诗人的不朽作品，并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研究计划。我被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接着又当了十年中学教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转向了新的研究领域。1976年，我从中学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不久就接到一项任务：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编写字典所需要的例句。就这样，我初次接触到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在惊异之中，从内心赞叹唐代文学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多采。就在唐代伟大作家把诗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的同时，在民间也有无数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创造着全新的通俗文学样式，如象各种体裁的讲唱文学、歌辞、白话诗等等，它们所代表的文学新趋势，最终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后半期的主流。然而，这些在当时由人民群众所创作和喜爱的通俗文学作品，却远远没有为今天的人民群众所欣赏和接受，就是在专门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中，也时时表现出对它们的隔膜

和误解。

这是有原因的。今天阅读敦煌变文、王梵志诗和其他敦煌俗文学作品，存在着三个主要障碍。一是由于抄写卷子的人文化水平低，原卷文字错讹脱漏严重，其间还有许多当时民间流行的俗字，也增加了辨识的困难。二是其中使用了大量唐五代的口语词汇，这在当时虽是一听就懂，今天的读者却感到难以索解。三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它们反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观念，和我们有较大差距，例如其中有大量描写佛教题材或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今天的一般读者就很难读懂了。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和外国几代敦煌学者的努力，敦煌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例如王重民先生等编的《敦煌变文集》，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过初步校勘、比较完备可读的变文总集，蒋礼鸿先生著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就是解释变文中俗语词的开山之作。我在接触敦煌文学之初，所能看到的就只有这两部著作，是它们把我领进了敦煌学的殿堂。不过敦煌文学（这里主要指敦煌俗文学）研究中有待解答的难题多如牛毛，因此我把继续攻克这三个障碍作为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

这就需要重新学习。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曾经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书，有了一定古代文化的根柢。这一次则是埋头通读了若干部篇幅浩繁的大书，例如《大藏经》，五代以前的正史，经部和子部的许多著作，《全唐诗》等总集读了不止一遍，《太平御览》本是供查阅的，我也逐条读完，这就等于分门别类地读了许多古佚书的残文。在这个基础上，再旁及别的杂著乃至某些较偏僻的著作。

曾经有研究生问我：你啃大部头的书，例如花上两三年时间通读《大藏经》，难道不觉得枯燥吗？读完以后，究竟又有多大的收获呢？

这一切都取决于怎样去读它。我在通读《大藏经》以前，也曾犹豫过好一阵子。可是要真正弄通敦煌文学中有关佛教的许多问题，这是最彻底的办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一咬牙，就读下去了。每当遇到与此有关的材料，便欣喜异常，兴趣大增；否则也会感到枯燥。不过很快我便发现，佛藏实在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大宝藏，从中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收获，原来的阅读目的太狭窄了。举例说吧，历代翻

译佛经的人，多数都不是汉族人，他们是从实际生活中学习汉语的，不可能象汉族士大夫那样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自然不可能象汉族士大夫那样“掉书袋”。这就造成了汉译佛经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中保存了自东汉以来大量的珍贵的口语资料。因此，从佛经中搜集实例来和敦煌俗文学中的唐五代口语词汇相印证，也成为我的一件乐事。又比如，在这以前我已精读了《太平广记》和大量笔记小说，记得鲁迅先生曾举出吴均《续齐谐记》中“阳羨书生”的情节来源于佛经的著名例子，实际上中国早期小说和佛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从我积累的材料看，竟有若干小说的情节是改造佛经故事，或受了佛经故事的影响而形成的。《红楼梦》中王熙凤毒设相思局的情节和《三笑》中秋香戏弄华氏兄弟的情节有相通之处，应该都是受了唐皇甫枚《三水小牍》中“却要”故事的影响，而“却要”故事却是从《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卷二所载长者妻戏弄五少年的故事移植而来，只是皇甫枚把这个故事完全中国化了，所以使人不容易发觉它另有来源罢了。从深一层看，佛教的某些观念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历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直延续到近代。我在童年时代，常常听到街坊大人责骂孩子，总是称为“冤家”、“短命鬼”等，后来又读了元杂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及至研究王梵志诗中“怨家杀人贼，即是短命子。……债主暂过来，征我夫妻泪”（《王梵志诗校辑》七六首），这才认真探究这种观念的来源，原来答案就在佛经之中。《五苦章句经》把“父子夫妇”等等各种关系归结为“怨家”、“债主”等五种因缘，《众经撰杂譬喻》中就记载了短命子向生母讨还前世冤债的故事，影响所及，在我国小说中这类故事举不胜举。《太平广记》卷一二五《卢叔伦女》所写的短命子，不但讨还前世钱财，兼及父母的眼泪，这就是王梵志诗中的“征我夫妻泪”。由此联想到《红楼梦》第一回中绛珠仙草“还泪”之说，就觉得不是无源之水了。在我读完《大藏经》，进行自我小结时，我认为两年多的时间没有虚掷，因为我不但积累了敦煌文学研究的许多宝贵资料，更重要的是从一个侧面，对于中国文化史有了更为真切和深入的认识，仿佛潜水员开始看到大海深处另一个奇异的世界一般。在我读完其他大部头著作时，也常有类似的感受。一个治学者

在学术的海洋中，一旦领悟到融会贯通、豁然开朗的境界，天下乐事莫过于此了。

因此我对这位研究生说，你如果要研究中国古代学术，趁着年纪还轻，下决心坐几年冷板凳，啃几部大部头的基本书，这会使你终生受益的。不要急功近利，但不是不要功利。读书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因此一定要带着满脑袋的问题去读书，在读书中搜集解决问题的资料，并且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搜集解决新的问题的资料，使知识象雪球般越滚越大，使已有的知识彼此搭桥，如此往复不已，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治学领域和治学门径。

各种学术之间从来就不是隔绝的，现代学术研究已经显示出综合的趋势。研究敦煌文学，如果不满足于浅尝辄止，那么同时在语言、历史、宗教、民俗……等等相关学科上也下一番工夫，就是必要的。一个人当然不可能门门精通，可是学识的深广程度决定着学术成就的大小，却是事实。我们只有通过永不疲倦的求知欲望去努力接近这个目标。

读懂敦煌文学作品是研究敦煌文学的前提，由于敦煌写本的特点，文字校勘和语词诠释就是深入研究的第一步。陈垣先生指出校书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而于理校法则曰：“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这些都是校勘敦煌写本的基本方法，而在许多场合，往往只有正确运用理校法才能解决问题，而这不管是对研究者学识的严格考验。手眼的高低取决于基本功的深浅和知识面的宽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一般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未必够用。例如字形相近是写错字的重要原因，可是写本误字往往与今体文字略不相似，因为它是和当时民间的俗字形体相近。又如字音相近是写别字的重要原因，可是写本误字读起来和正字差别甚远，因为它是和唐五代西北方音相近而写错了的。又比如有的词语非常眼生，辞书从无记载，然而并没有写错，因为它是传统训诂学所忽略的口语词汇。何况校勘并不单纯是文字问题，首先是对文意的理解问题。这其中的问题五花八门，不打一处来，研究者只有相应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才有可能应付裕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

文》有这么几句：“狱中罪人，生存在日，侵损常住游泥伽蓝，好用常住水果，盗常住柴薪。”其中“游泥”一词，我曾冥思苦索了好几年，有一天突然醒悟，原来应该是“淤泥”，“淤（污）”字由于形近错成了“游”，“污泥伽蓝”是说把寺院弄脏。说穿了极其简单，得来却十分不易。因为我曾在佛经中几次读到弄脏寺院将受恶报的话，这才有可能茅塞顿开，否则以我之钝根不慧，也许至今还在绞脑汁呢。王梵志诗中有这么几句：“积聚万金花，望得千年有。不知冥道中，车子来相受。”有的文章认为“车子”错了，应该改作“妻子”等等，却不知道“车子”原是人名。干宝《搜神记》卷一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周孛嘖的人，命定贫穷。有一天梦见天公可怜他，把命中注定属于尚未出生的张车子的钱千万，暂时借给他，从此果然逐渐成了富人。周家有个贫穷女雇工张姬，在车房生了个私生子，取名车子。后来周家就逐渐穷了，而车子长大后却成了富人，命中属于张车子的财富终于还给了他。《文选》卷一五 张衡《思立赋》云：“或辇贿而违车兮，孕行产而为对。”旧注也详引张车子故事来解释这两句，李善注说见《鬼神志》及《搜神记》。《抱朴子内篇·辨问》也说：“为人生本有定命，张车子之说是也。”可见张车子故事自东汉以来，流传十分广泛，梵志诗正是用了这个典故，说明贫富循环，皆由天定。研究者浏览偶有未备，就造成了错改原文的结果。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敦煌文学所反映的生活尤其如此，因此我们虽然以研究敦煌文学为方向，可是眼界始终要放得更开阔些，力求更多地了解那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乃至某些细节，实际上就是要透彻地了解产生敦煌文学作品的那个历史环境。王梵志诗中还有这么几句：“佐史非台补，任官州县上。未是好出身，丁儿避征防。不虑弃家门，苟偷且求养。”这诗是写佐史的，“苟偷且求养”究竟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中国封建社会提倡孝道和尊老，唐代也有“侍丁”制度。《唐六典》记载，凡民年满八十、九十乃至百岁，分别给侍丁一人、二人乃至五人，以尽终养。侍丁免除各种徭役，多取近亲，但也可外取白丁充当。唐代品官的直系亲属有免役的特权，可是佐史是胥吏，“未是好出身”，没有这种特权，他们的成

丁子弟是要服兵役的。然而佐史自有“避征防”的高招，那就是让他们的子弟充当侍养老亲的“侍丁”，这就是“苟偷且求养”，其中自然免不了移花接木等等手段，所以作者用了“苟偷”二字。当了侍丁就不愁离乡背井，所以说“不虑弃家门”。这样看来，这几句诗写了佐史为子弟逃避兵役而走后台的普遍现象，可以补史书的漏载，加深对那个社会的认识。不过王梵志诗的原文并没有出现“侍丁”这类字样，如果我们不是很熟悉唐代的制度，便很难读懂这几句诗了。梵志诗中还有这么几句：“本巡连索人，樽主告平人。当不怪来晚，覆盞可连精。”这几句诗中需要解释的地方很多，这里只解释“索人”和“平人”。这两处的“人”字其实都是重复记号，应该读作“索索”和“平平”。但这仍然很难懂。在《唐国史补》、《刘宾客嘉话录》、宋窦苹《酒谱》和《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一引《赞宁要言》中，都曾提到唐高宗时壁州刺史邓宏庆创制“平索看精”四字酒令的事，而“索索”和“平平”就在这四字之中。四字酒令的具体内容在宋代已经失传，所以今天难言其详，但是沿着它的提示继续考索，就可以明白这首费解的诗，其实是写饮酒行令之趣。你看，能否读懂一首诗，关键就在于是否知道久已失传的四字酒令这么一件小事。而要深入地研究敦煌文学，就要从弄清许许多多这类“小事”开始，进而在不同的层次上不断地分析和综合，上下联系，左右贯通，实现认识的飞跃，才能得出各种准确和全面的结论。

敦煌文学作品是古代人民的创作，经过一千年的历史尘埋，今天我们有责任恢复它原有的夺目的光采。目前我正在写作《敦煌变文选注》，集中了变文中的精华作品详加注释，目的就是为更多的学者来研究这份珍贵文化遗产提供方便，也是为了使这份珍贵遗产能够逐步走入今天的人民群众之中。

老树春深更著花

清词述略(下)

严迪昌

· 文学史百题 ·

“盛世”崛起的“浙西词派” 康熙十八年(1679)清王朝“博学鸿儒”之征,是王朝政权发展的重大转折的一个标志。这时相距明朝鼎革已整三十五年,而“三藩”乱定在望,所谓“河海晏清”局面形成。客观现实使遗老们都消弭了“恢复”之志。如黄宗羲《南雷文定》的各类文字中明显的变化是从这年开始书录清朝年号,承认了这个新王朝了。一种“盛世”气象已开始牢笼朝野,词风不能不发生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正是时际运会,应运而生。朱氏以“名布衣”称旨,“鸿博”殿试后授翰林院检讨,从此名重京师。他进京时携来《乐府补题》传抄本,后经蒋景祁刊刻,一时“后补题”的咏蝉、咏白莲、咏蓼、咏龙涎香等咏物之风炽盛。他主编的《词综》适在康熙十七年付梓,龚翔麟汇合朱氏及李良年、李符、沈岸登、沈岸登,以及翔麟本人的词刊刻为《浙西六家词》也是在康熙十八年。其时词坛耆宿如吴伟业、龚鼎孳逝已多年,曹尔堪亦卒在这一年。王士禛则早已“位高望重,绝口不谈”倚声之道,而陈维崧虽同在京师,却贫病交加又不合时宜,不久也病逝。“时势”和“人望”,加上周围的群体,朱彝尊是足以号召词坛,一变词风了的。清词至此又一次发生了嬗变。谢章铤在他《词话》卷七中说:“余尝怪今之学金风亭长者,置《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于不讲,而心摹手追独在《茶烟阁体物》卷中则何也?”金风亭长为朱彝尊的号,《江湖载酒》一集是他浪迹大同和失意京师时的前期作品,确有不少佳篇,诚所谓“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解佩令·自题词集》),《静志居琴趣》是与他的“风怀诗”相表里的言情追怀作品,有真情实感。《体物》一集则专咏物,另有《蕃锦集》系集句。谢氏没说错,朱竹垞开创的词派影响所及,更多的是咏物题图,后之步趋者既无朱氏阅历又无他浩博的“腹笥”,于是陷入恒订陋习,学姜夔、张炎

的“清空”之格也每每显得清而无物，空枵而已。人们总是归咎于“始作俑者”，其实朱彝尊供清要之职后，即欲“空中传恨”也已不能，后之学者在那种“时势”下又怎能得其真谛呢？问题是“浙西”盛行，原先百派分流、千姿百态的多元共存局面消失；咏物风靡，不仅现实感散漫渐尽，而且词的抒情主体的意趣也日衰。谭献在《篋中词》中说：“锡鬯、其年行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事实上，陈维崧去世后，阳羨一派已不合“时势”，“词论”之讥迭起，该派很快衰落。乾隆后期宜兴词人卓然名家的如储秘书《花屿词》、任曾貽《矜秋阁词》也都已非复迦陵一脉。倒是稍前的郑燮《板桥词》、蒋士铨《铜弦词》、黄景仁《竹眠词》仍不失豪宕情韵，但他们都难以列为阳羨派中人。而浙派则人多势众，师承不泯。在康熙前期，除“六家”外，较著名的尚有汪森、邵宾、高层云等，邵宾的《情田词》且得“浙西第七家”之誉。成就显著的其实还得推平湖陆隼的《雅坪词谱》。后人汇编的《梅里词绪》和《词辑》则大体收录了秀水一地的词家。到乾嘉之际，孙麟趾所辑《七家词》也皆浙派中骁将。

谈浙派必须提及厉鹗和郭麐。厉鹗字太鸿，号樊榭，他的生活年代在康熙末期到乾隆前期，正值“盛世”。仕途无所获取，长期寄幕在扬州马氏小玲珑馆。《樊榭山房词》脱尽火气，深得清空灵秀之旨，特别是如《齐天乐·吴山望隔江霁雪》、《百字令·月夜过七里滩》等山水抒情之作，略无堆砌伥钉之病，诚是“浙派”巨匠。

郭麐字频伽，晚号复翁，江苏吴江人，后迁居嘉善魏塘，著《灵芬馆词》四种，是乾隆末期到道光前半期的著名词人。自从常派词论家以“柔厚之旨”传统标尺评郭词为“滑”、为“薄”后，论者即每弃郭频伽不论，是很不公道的。郭麐深感浙派末流空泛无物，意欲济之以情，挽转词风，并力求清新自然、机趣圆润来涤洗堆垛板实的陈辞滥调。他的诗是“诚斋体”一路，属当时性灵之派。他正是强调主体抒情性来纠词的弊病的。从他《灵芬馆杂著》以及《诗话》、《词话》中，可以看到他在艺术个性、风格等问题上的卓识。惜乎人微言轻，位卑无力，很快词坛就为“常州词派”所左右，他的影响无法扩大。

以词论见长的“常州词派”以张惠言、张琦兄弟和稍后的周济

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兴起在嘉庆年间而宗法一直延续到有清一代告终，影响所及直至近今。严格说来，“常州词派”是一个词学派别而不纯系词的流派。它的建树主要在理论上，至于词创作实践近乎失败，确如吴梅先生在《词学通论》175页所指出的“词涉隐晦，如索枯谜”。常派实际上是当时特定政治氛围和“朴学”领域“乾嘉学派”在词苑的派生物。张、周都是经学和史学家，他们言词主张有“寄托”，以“微言大义”之旨倡言外有意之法。这从纠补浙派空疏繁碎之风气来说，并非没有功绩，可是走向另一极端，则确如蒋兆兰《词说自序》指出的：“而宁晦无浅，宁涩无滑，宁生硬无甜熟，练字练句，迥不犹人，戛戛乎其难哉！”后来吴梅先生也批评说：“尝有意极精深，词涉隐晦，翻绎数过，而不得其意之所在者。此等词在作者固有深意，然不能日叩玄亭，问此盈篇奇字也。近人喜学梦窗，往往不得其精，而语意反觉晦涩。”（《通论》9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晚清四大家朱孝臧等著名词人的某种倾向的批评。但是，应该承认，“常州词派”在词学理论的建设上表现出来的自觉性、系统性和严密性是清代任何词派所未能企及的。从张惠言《词选序》到周济《宋四家词选》中的论评以及《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辑存的论述，特别是谭献有所修正的理论《复堂词话》（后人汇辑），在对词的艺术手段，对词旨词境的赏鉴方法等方面都有精当独到之处。只要去其牵强附会迹近索隐的一些玄论，是应该很好加以承继的。

不受“流派”牢笼的诸家词人 清词流派变迁概貌如上所述，一代清词的总貌大体如此。当然，这些流派只能表明清词演化的各个阶段，并不能尽见清词名家全体。并不为流派所限的如康熙名家就有顾贞观、纳兰容若、曹贞吉等。曹贞吉，山东安丘人，字升六，号实庵，有《珂雪词》。陈维崧《贺新郎·题曹实庵〈珂雪词〉》赞之为“雄深苍稳”，《四库提要》说是“风华掩映，寄托遥深”。都涉及一个“深”字。他的咏史怀古之作雄浑奔逸，几可与迦陵并驱，如《满庭芳·和人潼关》等篇。《留客住·鹧鸪》一阙则别有深情而折褶多转，尤为著称。纳兰的《饮水词》乃世人所稔知，其词师法李后主而真能得其神，关键是情的纯真深挚。他与顾贞观等酬答诸篇固已极佳，而《沁园春》（瞬息）

息浮生)、《南乡子·为亡妇题照》、《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等悼亡之词实是东坡《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以来绝无仅有的佳制。奇怪的是近时的选本和论著都舍弃不取,颇难理解。至于他塞外纪旅之篇亦系清人词中一绝。顾贞观,字华峰,号梁汾,无锡人。他的《弹指词》“极情之致,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别具俊逸峭劲之势。他传世名作《金缕曲》二首“以词代书”寄吴汉槎,披肝沥胆,情辞撼人心魄,属词史上不多见的瑰奇之篇。

清词的繁荣,造就了一大批女作家,从徐灿的《拙政园词》、顾贞立的《栖香阁词》到顾太清的《东海渔歌》都属不让须眉的大手笔。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基本上是清代女词人作品,另有《闺秀词钞》十六卷得人五百二十一家,系“钞补前汇刻百家词所未及”者。由此已足见妇女词作之空前发达。又创作的振兴,带来了理论的丰收,唐圭璋先生新增订本《词话丛编》所收八十五种著作,清人词话就占六十八种,阙失待访的尚有不少。

至于郭麐著《词品》十二则,列“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秾艳、名隽”十二品;杨伯夔又作《续词品十二则》,江顺诒再作《续词品二十则》,虽不免叠床架屋,但也不能不说明清词在风格的繁富多样与精细分辨上有了新的发展。只有创作实践的进步,才可能有理论的概括。正是因为唐诗出现了鼎盛之貌,始有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这道理是清楚的。

对清词研究的一些想法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有“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明,亡于清,而再振于国初”之说。吴梅《词学通论》列论清词二十七家,而清初占十二家。近李一氓同志《题跋》集中在跋《瑶华集》后也说:“言清词而不重清初期词,则有清一代无词。”我以为这些都是不刊之论,为有真知之灼见。事实也是只要理清清初期至雍乾之际词的发展衍变脉络,清词纲领即能提挈,而后谋一较佳选本,则巨细毕现。是故本文虽是挂一漏万,然稍费文字在前期,即此意向。当然,嘉道以还,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起,即现今通常称之为“近代”时期并不能轻忽。这是清词后期又一次呈现光辉的阶段。自龚自

珍，到邓廷桢，到蒋春霖，都是独具风采的名家。邓廷桢与林则徐天山唱和词以及邓氏《双砚斋词》表现了这位方面大臣内心的种种愤闷，一种民族危亡的忧患感十分显然。蒋春霖的《水云楼词》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产物，尽管他站在敌对立场上，但这场战争在封建文人心灵上引起的悸惊和深沉的悲慨，从另一角度折射了时代的剧变。蒋氏词在抒情艺术的表现上的高超手法，也说明“常州词派”并不能概言词艺的定规的。福建的谢章铤等在家国危亡之际，大声疾呼“至今日词学，所误在局于姜史，斤斤字句气体之间，不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云云，他所作《赌棋山庄词》以及和刘赞轩等的“聚红榭雅集”所谱词慷慨悲壮，连谭复堂也赞为“多振奇独造语”（《复堂日记》己丑年）。这些都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清词上距宋词四百年，两者之间既有承继性又有变异性，对清词众多流派、风格的研讨，从因、变的角度反观上溯，诚有助于我们对宋词的研究。拉开时间空间的距离，似可更细微地从对后人的影响、分流的痕迹上辨析清楚宋词各家之间似同实异、同中有异等问题。我以为这是词史研究、历代词派研究极不可少的一步工作。至若清词在题材的扩大，抒情的细腻深入，以及原有题材如山水、乡土风俗、边塞、悼亡、赠别、怀人、咏史、怀古、咏物等方面的有所丰富增进，那是时代与社会的发展的必然，其理如同我在《清诗平议》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所以，总的说来，清词是一代新词，不应简单化地从是否向唐宋词回归的命题上去考察。任何一种文体，如果只是从前代的艺术积累中去讨生活，一味以前代的成就为模式去追逐，这本身就意味着是没落、凝滞，是无“中兴”可言的。因而，如果习惯于承沿陈说，胶着于或主南唐北宋、或主南渡姜张等等之辨，实不足以说清词的价值，也难以审辨清词的真貌。

清词的研究尚处在筌路篮缕阶段，一部总集尚未编就，作家与流派的研讨也甚薄弱，故而要求纵论全面，决不是个人所能的事。援作述略，仅属问路之砖石，盼请各方教正。

先秦时期的士

· 历史百题 ·

刘泽华

先秦时期的士，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阶层，从王庭到社会底层，从文到武，从高雅的理论界到汗水滴滴的劳动场面，从神秘的外交到对垒厮杀的战场，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这里只能简单勾勒一下他们的历史发展特点以及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化中的历史贡献。

一、士的历史发展概况

殷商时期士暂且不论，就西周战国而言，士的含义极广，中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致可从三方面考察：

1. 士的含义

先秦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不下一百五十种，无论在西周或战国，士都有多种含义，必须连同上下文具体把握。分类论之，大体有如下几种含义：

第一、男子通称。《诗·邶有苦叶》：“士如归妻，待冰未泮。”大意是：小伙子迎亲到家，不要等到寒冰融化。

第二、等级系列中的一个特定等级。（下详）

第三、军士。《诗》中有许多篇叙述了士从事争战的心态。春秋时期战争连绵不断，有关军士的记录不胜枚

举。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军事革新，军士的名称十分繁杂，如“选士”、“练士”、“锐士”、“精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教士”、“爪牙之士”、“虎贲之士”等等。

第四、文士。主要从事劳心和精神活动的人。（下详）

第五、西周春秋卿大夫亦称士。《诗·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孔颖达疏：“士，朝廷之臣也。”《左传》襄公十年称郑三卿子驷、子国、子耳为“三士”。到了战国，高级官吏泛称为“士大夫”。

第六、狱吏与低级官吏。《尚书·吕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孟子·梁惠王下》：“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许多注家一致认为，士指狱官。低级临民官吏或高级官员的属吏也多称为士，如《管子·八观》把里尉称之为士。

从西周战国，士有多层含义，不可以偏概全，如有的说，春秋以前的士即武士，或把士视为知识分子，还有的认为士与民基本相同等，均不确。

2. 由特定等级向社会阶层转变

士尽管有多种含义，如从社会地位考察，从西周战国，其地位曾发

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即从等级系列中的一个特定等级转化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在西周春秋，士是等级系列中的一个等级，《左传》昭公七年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十等为：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从春秋的实际看，士上面有王、诸侯、卿大夫，下面有庶民、奴隶。西周与春秋，每人都隶属于一定的等级，士作为一个等级有它特定的规范，衣、食、婚、丧与其他等级有别。《荀子·富国》载，天子穿红色的龙袍，戴冕；诸侯穿黑色的龙袍，戴冕；大夫穿次一等的衣帽；士戴白鹿皮的帽子，穿土的衣服。《庄子·天下》载：“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孟子葬其母与其父不同，为母办丧事以三鼎，为父以五鼎，因为“前以士，后为大夫”（《孟子·梁惠王下》）。士作为一个等级是固定的，但它的成员却又具有流动性。士的来源大致有三个渠道：其一是王、诸侯、卿大夫的庶孽后裔。按照宗法制规定，只有嫡长子（也有例外）才能继承父辈的爵位。其他子孙，如不能因某种原因获得封赏晋升，他们只能下降到士这一等级。其二，庶民中的“优秀”分子，经过一定程序可以晋升为士，“三礼”中讲的“选士”、“贡士”制度虽然有可疑之处，但也不是子虚乌有，在史籍中可以找到庶民晋升为士的证据。其三，士之嫡长子继承为士，余其子弟下降为庶人。士这一等级中的成员比其他等级中成员

的流动性既快又广，使士成为各等级中最活跃的一个等级。

从春秋中后期起，士这一等级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到战国虽然士仍有等级的意义和痕迹，但已转变为一个阶层。社会阶层不同于等级，等级是由政府明令或由习惯法约定俗成的规定，社会阶层则由多种因素形成，其中主要的是社会活动方式。战国时期士作为阶层最主要的特点是，他们居于官民之间，主要从事各式各样的精神活动。

士从等级转变为阶层是当时历史运动的结果。春秋战国是旧的等级制破坏和新的等级制再造时期，在这种变化中，士没有纳入新等级制之中。为什么士没有纳入新的等级又有各种原因，其中主要一点是因为士的上下浮动较大，成员复杂，不可能再作为一个稳定的等级。反过来，由于士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等级，他们的活动范围也更大了，上交王侯，下与氓隶为伍，在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都可找到他们的足迹。

3. 由以武为主转变为以文为主

有一种说法，春秋以前的士皆武士，细加考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但就其社会角色而论，大致是不错的。春秋以前的士，从社会地位看，它是一个等级；如果就其社会角色而言，他们的多数以充当武士为业。从文献中到处可以看到，士与兵戎紧密连在一起。春秋初，管仲佐助齐桓公改革，其中有一项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措施。管仲规定士主要职能

就是从事军事训练和打仗。当然战争并不是士的唯一职业，还有相当一部分士在国家机关与大贵族家中充任各种职事官和家臣。《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述了士在王宫充任宫正、膳夫、庖人、医师、兽医、酒正、司书、司裘等各种职事官。《左传》中有关士充任卿大夫家臣的记录比比皆是，如孔子年轻时为士，就曾在季氏家作过委吏（管理仓库的会计）、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吏）。

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士的社会角色逐渐由主要为武士转为主要为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操笔杆的和说客都应是文士。墨子对文士的职能特点和类分作了这样的概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战国时期有关文士的称谓不下三、四十种。以类分之，可划分为三类：一类以从事理论思维和追求道德理想为人生追求。用孔子的话，“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先秦典籍常见的“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正士”等等，均指这一类。另一类可称之为智能之士。这些人重在知识之用，所谓的“法术之士”、“智能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游说之士”、“策士”等等，均属之。还有一类可称之为技能之士。这是一些有专门技术和一技之长的人。他们以技术参加社会活动与交换。《商君书·算地》：“技艺之士资在于手。”战国时期的士，除从文之

外，还有许多角色，这里不一一论述。

士由以武为主到以文为主的历史转变，并不是由武士变为文士，而是原来士中的文化人部分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变革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是其发展动力。这时期的士也不是不从武，不过军士主要由庶民充当了。

二、士在政治、思想文化转型中的伟大贡献

关于先秦的社会性质问题，我们不去讨论，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确凿无疑的，即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变时期，姑且称之为转型。士在转型过程中极为活跃，他们社会活动的特点是多线条多方向的。这里仅就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贡献，撮要加以述评：

1. 由氏族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转变的主力

以春秋为界，前由氏族贵族垄断政治，即所谓宗法分封和世卿世禄的结合；到了战国普遍实行官僚政治，即除君主以外，官职常设，任职者流动。官僚制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有一点非常清楚，春秋时期家臣制中包含了官僚制的因素，如家臣无封邑（有作为俸禄的食邑），不能割地自主，也不世袭，权力是暂时的，并对君主负责，可上可下。从历史渊源看，官僚制是由“家臣”制发展而来的，家臣主要由士充任。君主需要集权，分封制与世卿世禄是一大障碍，而家臣制则是最便宜的形式。君主集权的强化与发展同官僚制的推行是相